

李鸿章与胎死腹中的“两广独立”

1900年,朝廷调任李鸿章回北方担任直隶总督,他却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喜悦之情。北上之前,他决定顺道先去一趟香港,见一见英国港督卜力。卜力希望他能够以两广为基地,在中国南方建立一个新政府。

北上之前

卜力不是第一个企图给李鸿章“黄袍加身”的中国人,将李鸿章推上帝国权力金字塔的尖顶,在西方列强那里,是极有传统的。早在甲午年间(1894年),美国人就曾经策划过一场密谋,在中国实现改朝换代,由李鸿章父子取代清朝统治中国。光阴流转,转眼已是庚子年(1900年),这一回,准备给李鸿章黄袍加身的,变成了英国人。

刘学询是近代史上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能文能武,亦官亦商。在晚清的风雨飘摇里,刘学询怀抱着强烈的帝王梦四处奔走,与孙中山、康有为、李鸿章等人瓜葛颇深。因为政见各异,孙中山与刘学询曾数年不通音讯,庚子年夏,二人突然再度恢复联系,据冯自由《革命逸史》记载:“总理在东京忽接刘(学询)自粤来书,谓粤督李鸿章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

刘学询此时正是两广总督李鸿章幕府里当红的心腹幕僚。孙中山怀着将信将疑的态度,与平山周、宫崎寅藏等人离开日本,于当年6月6日抵达香港。此刻,李鸿章正受到幕僚刘学询和港督卜力的双重鼓动。为人谨慎的李鸿章没有留下太多关于这一事件的直接信息。但可以肯定,刘学询给孙中

山的书信得到了他的默许。

闻知孙中山已经抵港,刘学询等人又派船来迎,邀孙中山过船商谈。出于安全考虑,孙中山指派宫崎寅藏等人赴粤,自己则乘船避往法属西贡。宫崎寅藏抵达广州之后,与刘学询一夜密谈,结果是:刘学询代表李鸿章当场答应贷款10万两白银给孙中山,但对两广独立,则言语晦涩地表示在“各国联军未攻陷北京前,不便有所表示”。

刘学询将与孙中山联络的结果报告给李鸿章的时候,这个担负着维持帝国南方政局稳定的大员,既没有砍掉孙中山使者的头,也没有作出任何实际的承诺,他躺在深深的藤椅里,半闭着眼睛,做出了一个“颌之”的动作——这个动作的含义是如此模糊,甚至还带着些许的傲慢与慵懒。

联军的攻势越来越猛烈,老太后也自知插下了一个天大的娄子。“裱糊匠”李鸿章又一次成了她的救命稻草,一道又一道圣旨接踵而来,催促他北上,替帝国去擦屁股。

与卜力的会谈

北上之前,李鸿章乘坐的平安号轮船先在香港靠岸。

卜力在码头上已经等了很久,他的心情的迫切程度和他呈给英国政府殖民部的电报一样焦躁。他在电报里分析:反清起义预计将于两周内在南方爆发,信任他的中国绅士向他保证,造反者并不排外,并希望在取得一定的胜利之后得到英国的保护;卜力还说:“如果赞成孙中山和李鸿章总督缔

结一项盟约,对英国的利益将是再好不过了”;在李鸿章是否会“背叛”清政府这个问题上,卜力的判断是:“这个李总督正向这个运动卖弄风情,谣传他想自立为王或是当总统。”

李鸿章被从轮船请入密室。在表演了一番避重就轻的外交辞令之后,李鸿章突然不做任何铺垫,直截了当地问卜力:“英国希望谁做皇帝?”

卜力说:“如果光绪皇帝对这件事情没有责任的话,英国对他一定条件下继续统治不会特别反对。”李鸿章继续追问:“我听说洋人们有这样一说法:如果义和团把北京的所有公使都杀了,列强就有权力进行干预,并宣布‘我们要立一个皇帝’。如果事情变成这样,你们将会选择谁?”

停顿了一下,李鸿章又补充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也许是个汉人?”

很难说卜力是否听懂了李鸿章的弦外之音,但至少他的答复没有令李鸿章满意:“西方大概会征求他们所能找到的中国最强有力的人的意见,然后做出决定。”

李鸿章用一种缓慢沉稳的语调告诉卜力:“慈禧皇太后是中国最强有力的人。”

最擅长破译中国人外交辞令的卜力也弄不清楚李鸿章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他只感觉到:这个老态龙钟的老人,说这句话时口齿异常地清晰。

海面上的孙中山也在焦急地等待着会谈的结果。但卜力传来的消息令他倍感失望:“他无意冒险搞什么‘两广独立’。”

皇帝梦炽烈的刘学询也深感失望。他本来已经和卜力达成协议,将李鸿章扣留在香港,然后宣布两广独立——当然,卜力的算盘是:趁势将两广也划入他的治下。卜力甚至都已经为李鸿章准备好了囚室。然而伦敦方面却有新的指示:不得扣留李鸿章。李鸿章此次北上,职责

是与众多列强交涉“分赃”事宜,伦敦方面担心扣留李鸿章,会成为众矢之的,引来一连串的外交麻烦。

继续做“裱糊匠”

尽管历史没有假设,但卜力和李鸿章的谈话仍然惹人遐想不止——如果卜力明确表示英国政府会支持一个汉族政权,李鸿章是否还会继续北上?

历史不容假设,1900年7月17日,李鸿章乘坐平安号从广州起锚北上。李鸿章坐在甲板上的藤椅里,所有人都在热汗淋漓中等着他下达开船的命令,但他很久都没有开口,半闭着眼睛,仿佛睡着了。

没有人敢过去提醒他。

南海知县裴景福,李鸿章的一位私交很深的老同乡,在这种压抑的气氛里登上了轮船。他祝贺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外洋有电,诸领事皆额手称庆。”

李鸿章缓缓地睁开了眼睛,用一种极为顿挫的音调说出了四个字:“舍我其谁!”

此后的许多个日子里,人们在评价李鸿章的时候,这四个字将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引用,只是看法迥异:人们或者津津乐道地谈论李鸿章“做汉奸做得当仁不让”,或者为他国势糜烂之际的敢于担当而感慨不已。

可是,当裴景福问及国事时,“舍我其谁”的李鸿章却哽咽了起来:“日本调兵最速,英国助之,恐七八月间不保矣!”当裴景福问到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国家尽量减少损失的时候,李鸿章已是泪流满面:“不能预料!惟有竭力磋商,展缓年份,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

敲钟的和尚在预言自己的死期。可悲的是,他说对了。

据《新华每日电讯》王树增/文

汉武帝为什么北击匈奴

汉武帝继承的其实是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他的父亲汉景帝在位的十几年里,“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终景帝时,时小人盗边,无大寇。”特别是在景帝朝最大的政治危机“吴楚七国之乱”当中,叛乱势力曾经联络匈奴,希望匈奴和他们内外夹击,一举推翻汉朝,但匈奴并没有趁火打劫,表现得相当仗义。因此汉武帝即位之初,汉匈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阶段。即便如此,汉武帝还是毅然决定,大举进击匈奴。这是由多重因素驱动的。

第一是复仇。自汉朝建立以来,整个大汉民族面对匈奴,内心一直燃烧着炽烈的耻辱感。后来汉武帝在诏书中说,他出兵匈奴的动机是“欲刷耻改行”,要洗刷前代的耻辱。前代的什么耻辱呢?在另一份诏书中,汉武帝提到了两件事:刘邦的平城之耻,吕后的国书之辱。这刺激着他时刻想着要效法齐襄公,复九世之仇,为祖先雪耻。

按春秋之义,正常的天下秩序当然是四夷向中央朝贡。然而汉朝建立之初,四海凋敝,国力不强,当时的局面实际是汉朝向匈奴朝贡。公元前200年,汉高祖率兵讨伐匈

奴,结果却被围困在平城,不得不答应了一系列屈辱的条件:汉朝不但要把公主嫁给匈奴,每年还要向匈奴奉献大量的物品。《史记》说,“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

因此,笼罩在大汉君臣头上的“耻辱感”是推动汉武帝出兵击匈奴的第一重原因。

第二是汉武帝的历史责任感。

和约订立之后,匈奴大部分时间能够守约,但是也有一些时期,比如汉文帝时期,曾经背约入侵,让整个汉朝不得安宁。为了防备匈奴,汉朝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正如贾谊所说:“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介胄而睡。”边关将士不得不枕戈待旦,整个大汉王朝也始终紧绷着神经。

在汉人心目中,匈奴这样的“蛮夷”是谈不上信义的,不能指望他们会一直守约。因此最好的办法,是以战止战,把匈奴从北部边疆赶走。

对于汉武帝自身来说,他不仅要解决自己这一代的问题,也要替子孙后代解决问题。因此当太子后来进谏反对他征伐四夷时,汉武帝的回答是:“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我替你解决一个难题,一劳永逸,难道不好吗?

张宏杰/文

图说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我们的
价值观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天津人郑国栋

人民日報
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网络电视台